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三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九期 ——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7c)

【自由论坛】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萧喜东
【学术争鸣】毛的反官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内在矛盾	贾英辰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六）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自由论坛】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 萧喜东 •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总和历史中的一些个人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总是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不可分割。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泽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关系，要比前面提到的两个关系要更紧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来源、理论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来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受中国官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的主流文革史学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文革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毛泽东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改造中国；在文革发动前夕，对当时的形势，包括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等等，做出了的错误估计。二，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听不得批评；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使“正确”的党的集体领导无法阻止毛泽东的“乱来”。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野心参与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介中，和海外反共的舆论中，首次出现观点一致的现象，即同声谴责文革。无论是一些共产党的老干

部、知识分子精英，还是海外持坚决反共的人士，在诅咒文革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

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民间知识分子也对文革的动因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多以批判“极权专制”的自由主义语言出现，同时也带着封建文人的潜意识。这些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解释，着重于毛泽东的个人利害关系，如报个人私仇、“清洗功臣”、防止“秘密报告”在中国重演、保持个人名誉等等。

然而，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笼统地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思想，很难说明问题：在文革开始后，两个对立的方面，从中央的两个司令部，到社会上的两大群众派别，都认为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一方，而认为对方是错误、落后乃至反动的一方。从搞形式上的“极左”（也就是所谓的形“左”实右）方面来说，作为“走资派”的刘邓集团和主要由党团积极分子和出身好的人组成的“保守派”可能搞得更多一些。文革斗争，从某种角度讲，已经不是左和右的斗争，而是两种不同的“左”的之间的斗争。第二，用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也无法说明文革的发生。因为，在文革发生的前夕，也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毛泽东的实际权力下降至最低点的时刻。若讲独裁，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把持中央，彭真、陶铸等人垄断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第三，文革发生是被野心家利用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当时的情况。在文革刚开始时，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以及地方和基层的党委对运动方向采取了很大的控制，也深深地影响了文革中派别的形成和后来运动发展的走向。他们所起的初始作用，恐怕比后来“野心家”们起的作用要大。另外，只注意精英层面上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范围内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也不能全面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

任何真正严肃的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探讨，都必然要脱离片面的、修正的、乃至有意歪曲的解释。这里，对文革前夕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对文革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文革前夕的一系列先行斗争加以分析，来探讨文革的来源、动机和理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文革动机的形成和理论准备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它的来源应结合以下三条线索来探讨：一、中苏决裂和反修防修；二、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和干部问题；三、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形成。中苏论战造成了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毛泽东在“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的方向等问题上，在思想上作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毛泽东发现了右倾文化文本和文化官僚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了以文化批评为突破点进行文化大革命。

◇ 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

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构思，从产生到成熟，是在中苏论争从内部转为公开、从枝节转向原则、从利益摩擦转到大是大非上的冲突的这十几年。这十几年中，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独立地探索、实验的重大时期。在这十几年中，不仅有同帝国主义首霸硬碰硬的恶战、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及其残存势力的尖锐斗争，也有和苏联领导集团、继承沙皇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舌战和激烈斗争；在国内，在对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之火最后烧进了共产党内。总之，这是一个各种斗争都集中交汇的时期，反帝和反修纠缠在一块，反修和防修交织在一起，国际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国在发展建设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汇集成一个整体的斗争。

中苏两党的论战由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所引发，一开始围绕于斯大林问题和对帝国主义斗争策略问题，但争论的重点很快转移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依靠“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南斯拉夫演变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等重大问题，最后论战上升到有关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理论和原则，争论的焦点也集中到苏联社会的性质是正在“和平长入”走向共产主义，还是急剧滑向修正主义的“假共产主义”。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分歧，很快地也不可避免地联系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分歧。中共方面很快地指出了问题症结所在，即苏联体制内“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鼓吹者、执行者和受惠者——苏联的特权阶层，这个正在迅速向已经出现在南斯拉夫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蜕变的集团。

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批判，使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做出了重大的反思。随着和苏联论战的激烈，在人民公社上的争论，有关文化艺术的争论，对来自人民群众对党的官僚主义不满的声音等问题上，国内党内的斗争也尖锐激烈起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学自苏联的“一长制”、“一条腿”走路、物质刺激、专家治国等，开始了全面扬弃和批判。由于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字，和国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批判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文字也交织在一起，如第九评中的总结性思想也出现在国内问题的文件中，如《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选择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随着和反修问题的衔接，其潜在影响和利害关系也变得更加重大。受国际斗争影响的国内斗争，也反过来具有国际意义。中国能否走出独立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能否为广大的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提供经验，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在百多年来受西方冲击、模仿西方、借鉴西方之后，第一次具有向外辐射影响的机会。尽管在帝国主义贸易禁运和军事、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的脉搏息息相通。

◇ 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的激烈斗争。不久，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份）》，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笔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为会议最后声明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系统化了的修正主义纲领写进新党章，中苏的彻底分裂已经不可挽回。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一些人指责毛泽东建国以来“犯了一个又一个极左错误”，“一次比一次脱离实际”。可以理解，那些无法认同毛泽东在经济上超越和突破苏联经验的尝试的人，更无法认同毛泽东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诊断。然而，“左祸”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的思想，和毛泽东五十年代的思想相比已经有重大区别；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发生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可以说毛泽东五十年代还在认识和摸索包括苏联在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六十年代则开始坚决批判当时的苏联体制。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文化艺术部门仍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等思想，自然在哲学基础上和他五十年代以及以前的思想相一致，然而，却和反右、大跃进时期的思想有以下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增产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正因为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革运动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在数量上超英赶美、抢时间、比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尽管其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相比之下，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指出他们随时会配合国民党和美帝反攻大陆。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丧失刚刚夺取到的政权的危险主要来自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开展的。进入六十年代，这一部份前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泽东发现他们竟然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党内那些热衷于引进资本主义、时刻准备和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它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如“四清”社教等，运动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剥削阶级，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假如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中，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急进乐观的，那么，在反修斗争中对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的预期则充满了凶险的挑战和不确定感。毛泽东在他亲自执笔的中共第九评中，在批判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许诺后，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被中外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责为乌托邦空想家。然而，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梅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思想风格中有很强的“反乌托邦”特色（dystopia）。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〇年以后，毛泽东反复发出有关革命有可能马上会遭到腐蚀和颠覆的梦魇般的预言和警告，如“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中央会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在身边”等等。毛泽东对全党发出震聋发聩的警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无疑，毛泽东这些危言般的警告，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感，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僵化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历史决定论，找回了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历史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种“不经斗争、和平渐进、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

◇ 阶级与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在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思想上重大转变和突破中，最突出的新思想是有关阶级与政权的论述。这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部份。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特质。

列宁早已经预见到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土壤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萌芽；列宁也认识到，党外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成为党内的路线斗争。经过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列宁的认识，认为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然而，毛泽东对列宁理论的新发展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发挥其政治经济影响，而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尚无法消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通过其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来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要通过在现体制内占重要位置的人来作代言人和代理人，来实现它的利益。

资产阶级法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已被消灭的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员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膨胀，会危及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等级工资制和级别本位主义常常导致对革命热情的丧失，因此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层面上，资产阶级借以存在、发展，并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在执政党内寻求代言人和代理人。这些代言人和代理人，很多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的阶级异己分子。然而，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中，比仅仅的“蜕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要复杂，它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所讨论的党内资产阶级，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一）他们本来就是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二）作为党内政治派别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缺少革命的彻底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三座大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全中国解放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四清《十条》）”（三）以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和更广泛的眼光看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和经典意义下的资产阶级类似，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相联系的一个阶级。这个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作为特权阶层，他们的利益总是掣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尽情实现，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党外的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作妥协、并和他们携手合作；由于他们掌握着从上到下的政治权力，机会成熟，他们就有能力不顾工农群众的反对，大肆引进一切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

显而易见，这三层意义，逐次丰富、全面，以第三层面上的意义最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问题的创新思想。在第一层面上，“党内异己分子”并不是新的问题，因为历史上共产党一直都在和党内的叛徒、特务作斗争。在第二层面上，已经提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文革命题；是在第三层面上，提出了文革的中心命题，就是阶级和政权的主题。在第一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进行复辟，一般需要搞公开的反革命政变。而在第三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能够以极大欺骗性的手法，通过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长久化，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三种层面意义下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文革运动中的文斗和政治斗争中都有所表达。在对“党内资产阶级”意义了解不深、局限在第一层意义的情况之下，运动就被误导成单纯的“揪叛徒、抓特务”的活动（实际上保守派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未能把认识提高到“党内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共生体，也就出现了把运动局限于“揪人革命、罢官革命”的问题。只有基于第三层次上的认识，才把揭露和打击走资派与造反夺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去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资产阶级实现和平演变的制度基础。

也正是从第三层意义上的观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正是在这个说法上，文革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诘责。似乎“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相矛盾的。实际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就是

这样看问题的。在老干部、“党内民主派”中，不少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农民造反思想，无法接受他们自己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这个事实。在文革初期，对于谁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从中央到基层群众都产生了分歧，是把矛头对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仅仅对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乃至他们的后代，成为分辨造反派和保守派阵营的一个重要分野。将共产党内出现的一个官僚化、等级化的骄横跋扈的特权集团，与被打倒的帝、封、官势力的复辟企图相联系，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地、孤立地去看，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最深刻的洞见。作为既是老革命又是新革命的毛泽东，看到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预见到这个高喊革命口号、却逐渐丧失革命热情和革命原则的形“左”实右的“老革命”集团，在尝到了特权和腐化的甜头之后，最后会和他们与之斗争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握手言和，携手合作，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也就是在更深入、更彻底的层次上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剥削思想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把文革的意义仅仅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后代反对歧视、争取人权，甚或更加错误地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起来进行阶级报复、搞翻案、闹翻天，也是因为忽视了毛泽东“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真正含义。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换代”、看成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简单调换位置的观点，与“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观念，是出于一辙的庸俗革命观。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种庸俗革命观的彻底突破。

◇ 文化、阶级与政权：“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靠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才取得全国胜利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理论受到了新的考验。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资产阶级赖以依存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决出胜负。在社会主义这个长期的、存在激烈斗争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借以发生影响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有形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占有，转向无形的文化资源占有，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转向分散的、游离的旧思想、旧观念。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找回了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这个被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其它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的阶级与文化关系的理论也决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而恰恰是用一种全面、辩证的动态观点看问题。首先，毛泽东对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的探讨，离不开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经济条件的关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关注。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以一种“落后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资产阶级法权的，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以它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发生其影响：社会主义中特权阶层长期存在，必然要追求炫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消费，给整个社会渐渐带来一种崇拜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会反过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引进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创声势、造舆论，最终打开复辟的闸门，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故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证实。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注意到了文化与政权的关系。他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上层建筑领域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官僚，和以“古人、死人、洋人”为文本的封资修文艺所统治。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在《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題。”“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文化部门的城市老爷们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很多有关彭真个人生活挥霍、大搞特殊化（《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精英圈子的豪华生活等事实（《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而彭真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曾经“保护了大量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通过他们所垄断的文化渠道，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充斥到“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中去，而这些彭真家里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座上客、等级特权的受惠者，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和这个文化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了。他们传播给社会的信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已经是完全服务于这个既得的等级和利益集团了。

正如同毛泽东发现了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毛泽东也发现了党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默契关系。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们，常常试图去掩盖这种默契关系，甚或把攻击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反动权威”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乃至把文革误导成简单的另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对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深刻认识，正是发现了那些口头上很革命的官僚，实际上是“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文革的理论准备，包括了文化、阶级、政权方面三大主题。在文化层面上，文革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给予“迎头痛击”，然而，由于三大主题的紧密联系，就不能不触及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文革初期的“革命化”、“红海洋”等形式主义就是企图以局限在文化上的方法误导运动的进程。同样，文革之后，有人认为既然文革是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就只不过是托辞借口。这种看法最终导致“文革是场无原则的个人权力斗争”的错误结论。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批评为先导，以文化官僚的“独立王国”为突破口，开始了一场既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又是阶级、政治领域的大搏斗。

文革通过文化作导引爆发（1965年11月—1966年8月）以后，很快便转到了阶级的主题（1966年8月—1966年12月）。这就是文革初期“血统”决定阶级还是“立场”决定阶级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传统的阶级概念的得到突破：老革命、革干子弟假如不注意改造思想，成为享受特权的阶层，就意味着在政治思想上背叛了自身的阶级，转变成新的剥削机制的受惠者和维护者。阶级概念中政治思想认识所占的地位变得重要，和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长期动荡起伏、斗争激烈的过渡阶段的论断相吻合：在这个捉摸不定、谁战胜谁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阶段，阶级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而部份地取决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立场和认识。文革运动经过了文化和阶级两大阶段以后，进入了它的第三大主题——政权，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后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

《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四清《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二十三条》），一九六五年一月。

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刘仁的腐朽生活罪行》，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一九六七年九月。《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体育战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

## 【学术争鸣】

### 毛的反官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内在矛盾

• 贾英辰 •

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一说是毛和刘少奇等的权力斗争，一说是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还有一种混合说。本文第一部份想进一步论证意识形态分歧说。我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说政治路线的分歧，因为毛的不断革命的主张，超出一般的政治主张，近乎宗教教旨，不能形成一条稳定的政治路线。其实毛本人在晚期自视为思想导师不亚于自视为政治领袖。这是本文第二部份想加以说明的。

#### 一、

郑义先生的文章说，“海内外学术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利用人民来清除政敌这一点已有大致的共识，那种认为毛迷醉于崇高革命理想的解释已显得过于浅薄天真。”我听来这两句都有疑问。就我阅读所及，大多数作者似乎认为文革不是源于毛和刘少奇的纯粹权力斗争，而是源于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甚至不少作家干脆说这是共识。其次，革命理想干嘛一定崇高呢？这么遣词造句就有堵塞反对者之口的嫌疑。

有许多论据倾向于表明毛不是为单纯争权夺利发动革命的。这里举两条语录。这两条语录人所能详，但不常用来说明这里的论点。一条是七八年来一次。这显然是针对官僚主义将不断产生的设想，而不是专对刘邓的。第二条是毛自谓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二是文革。毛大概不会把一次权力斗争的成功看做平生两大成就之一。而且，毛这段话说得颇有保留，文革对错，要由后人评判；若只说打倒刘邓，就不必有这份保留了。

不过，我们更愿意关心的，实际上是澄清什么叫权力斗争，什么叫意识形态政治路线分歧。简单说起来，狭义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圈外的广大群众的政治取向没有什么关系。最典型的纯粹权力斗争是所谓“宫廷政治”。这个用语颇为生动地表达出了与广大群众的政治取向无关的意思。而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分歧则是说进行权力斗争的各方代表了权力圈外群众的政治取向。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显然和群众的政治取向具有互动的关系。这一点，最近的文革研究特别加以强调。例如，人们注意到文革中的广泛的群众参与，注意到文革中的派性是有政治基础的。所以我们



认为毛发动文革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不能赞同纯粹的权力斗争论。至于更狭义的权力斗争说、阴谋论，我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混合说，我们照样无法接受。这一说初看是最妥当的，因为文革中始终进行着大规模的权力斗争，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然而，凡政治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牵涉到权力斗争的；逆定理却不成立。所以，我们说毛刘之间有政治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时自然也着眼于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再说两者混合，不是更精确了，反倒容易引起混淆。至于六九年之后，群众参与越来越成为表面文章，政治斗争越来越接近宫廷政治，这原是所有革命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因此让我们得出结论说所有革命实际上多是纯粹的权力斗争。本文不争论我们应该把文革定义为三年还是十年，但即使定义为十年，文革头三年是文革核心，这一点很少引起争议。六九年后，毛、林、党的原高层领导、人民群众，都开始转换看待文革的视角。只有所谓四人帮这些铁杆文革派坚持文革理念。从这种眼光来研究六九年到七六年的中国政治取向将会有所收益，但这项研究落在本文范围之外。

下面我想进一步说明我的主要观点：毛发动文革，是想发动一场革命，而不是利用文革进行权力角逐。八九年之前大陆的不少研究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当广泛的论证，例如《晚年毛泽东》里萧延中的文章。八九年之后出现的文献，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例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下简称《李志绥回忆录》）。李志绥没有什么理论兴趣。这位医生本人其实倾向于把文革看作权力斗争，但书中那些生动的材料恰恰指向相反的理论结论。就此而言，这本书里的材料特别有利于支持我们的观点。从这本书不难领会到，一九五六年以后，毛的主要矛头始终是对准官僚阶层的。这和我们一般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

毛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追索。一是毛的造反性，反秩序反理性的天性。毛喜造反，喜乱，这点已成公论，无须论证。毛常告诉李志绥，他念的是绿林大学。“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和毛的个性有关。但我们无须把毛的个性作成主题。中共里面有很多人是喜造反的，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场却和毛相反。张春桥并无喜乱的个性，却为毛的文革思想前后奔走。历史人物的个性，只有在和广泛的历史诉求相呼应的时候，才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毛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里面有他的基本历史诉求。

二、毛好造反，好折腾；而且总是从小人物的立场出发来折腾。例如在《红楼梦》的讨论中，毛的矛头也不是指向俞平伯本人的，而是泛泛指向权威，替小人物说话。这顺理成章，本来是被压在下面的人才要造反，在逻辑上才能造反。毛的无数语录和行为都说明他坚持某种人民群众中心论——虽然毛是怎样设想“人民群众”的，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毛始终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众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这方面的证据也很多，这里只引用毛五八年前后写的一段话。“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份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这是批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钱崔使君序》一文边上的话，有感而发，不是为权力斗争而设的刁钻之辞。本文不遑研究毛的思想，但不妨提到，毛特别关注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群众，而是下层的精英份子，并且认同于这些人。而下层精英份子的生命力，原是一个极富意义的话题。

第三点是毛的乌托邦思想，对公社的爱好。毛对公社情有独钟，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费力论证，不仅他从未弃过农村的人民公社方向，而且根据五七指示的设计，农村、工厂、军队、学校，都要成为群众作主自给自足的公社。

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要看到这种联系，我们最好考虑一下，人民当家作主

的思想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古代就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近代更有民主思想、民主主义。然而，这些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困难，即，人民按照定义就是处在下层的。无论什么政体什么政治方式，到头来人民还是在下层。在西方，实行了民主制，可是最得意最舒服的还是资本家和官员，拿大主意的是这些人。所以，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你可以有一千种理论证明西方民主是真民主，但这改变不了人民实际上处在下层的基本事实。在下层，就是被压迫的阶层。至于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也许需要更多一些的解释，因为在许多人们心目中，由于有意无意的误导与自我误导，西方民主已经根深蒂固地被认作是真民主。尤其是那些后进国家中争民主的精英们。尽管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与该统治阶层是否对立人民或是否能代表国家的意志并无对应关系。在毛看来，不仅各种精致的民主理论可有可无，就连马克思那些精致的理论，意思也不大，剩余价值啦，社会发展啦，头绪太多，是书生在那里做文章，基本的事实无非是人民受压迫，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点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或什么社会都一样。对毛来说，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好，现在共产党造了反，成功了。可怎么样呢，造反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同时就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有个新阶级。即使现在施行统治的人是从前的被压迫者，反正他们今天成了统治者，人民还是在底层。于是还要造反。然而，再造一次反，结果不是又造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吗？是的，所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要不断革命，不允许任何持久稳定的统治，任何持久稳定的政体。持久的只有看不见统治者的公社，某种类似乌托邦的东西。

这样看来，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这三者可以形成一个逻辑整体。我们还别急着说，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粗俗，别看马克思的理论功力比毛深得多，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其实不过建立在社会发展数阶段的神话上面，在这种神话上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当然超不出理论虚构。熟悉马克思著作的朋友，在哪里读到过马克思从他的“科学”基础上推论出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结构？推翻了他所面对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社会该是个什么样子，他完全没有底。对设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零星几笔描述，还不如毛的公社设想来得现实来得具体。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认为苏联中国等国只是由于歪曲了马克思才造成那样一种畸形的统治。他们试图通过这样那样的修正重新展现马克思主义合理内核。他们一方面否定苏联中国等国的实践，另一方面却利用这些巨大的实践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以上说法有些道理。但马克思思想中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或代表了相当一部份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却需要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情况可能是：马克思思想总结性地宣扬以意识形态政治来取代现实，领导现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一、马克思成长在法国大革命的地震余波之中，这次革命不像以往几千年的革命那样，不仅是现实革命而且是意识形态革命。二、马克思和尼采一样生活在上帝刚刚死掉的年代里，精神的真空亟须由世俗的意识形态填充。三、现实从来是在传统中定义的。随着帝国主义完成对全世界的占领，传统统统瓦解了。所有革命的冲动都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掌握。

本文不展开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提到这些，只是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子虚乌有的东西，从来不曾影响过中国共产党革命，也不可能影响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一种广泛得多的意义上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即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没有界定自己的终极目标。不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后果，而不是它的歪曲。

用一条线索来归纳处在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里的极其复杂的毛主义，当然非常危险。但若尝试，我们说，毛始于造反有理，归结为不断革命，虽不中，亦不远矣。

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可以说是合乎逻辑地汇合在一起，汇成了毛的主要倾

向。四九年前，当然是打倒蒋介石统治。五十年代后，毛把这种主要倾向叫做反官僚主义。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提法，反官僚主义的提法始终没有完全废弃不用。看一下毛一向的讲话，特别是文革以来的讲话，主题就是官僚和群众的关系，而他永远站在群众一边，代表群众。

这种倾向在五六年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此时已建立起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然遥遥无期。……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他对共产党当年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李志绥回忆录》，113—114页）

从五六年起，毛就打算开门整风。中共喜欢整风，但从来不采用开门整风的办法。党的中高层一开始就对开门整风疑虑重重（党的中层以下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后来中止整风，反过来整右派，党非常高兴。邓小平这些人十分起劲，原是必然。一般从人性上说，邓比较务实并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温和，毛比较极端并在这个意义上更其辣手。但我们还不能从一般人性上来看待他们。从各自的政治要求出发，邓反起右来比毛还起劲，并不难理解。

五七年的转弯，停止整党而反过来整右派，对毛来说还不太困难。无论从私人感情还是从政治取向，毛对中共上层的敌意还不很深，反自己党内的官僚主义的思想还刚刚萌生，主要是反官僚主义，还不是反党内官僚阶层，还没有形成官僚阶层即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何况，那时离建国还不远，旧社会的人还在，还需要整。党比起右派，无论如何离毛更近些。毛之反官僚，是从左边反，原与右派反共产党官僚的立场相去甚远。

整右派，整任何人，毛倒是都可以想通的，不会太难过。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反倒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跳了出来，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人民群众。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当然是毛自己，他说话了，就是人民说话了，“人民”这个观念本来有几分抽象，因为它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吃穿住用来定义人群的。究竟谁代表人民，究竟代表人民有多重要，这里都不讨论。只需指出，虽然毛很乐于相信自己是人民的当然代言人，他的人民观念却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和人们日常的吃穿住用不相干了。右派不是人民，起码不是人民中心论的那个人民。

毛一旦确定他的政治策略，从不手软。反右又一次体现出毛的无情的政治铁腕。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毛对事态的转变远没有那么得意，反右毕竟不是毛的初衷。据李志绥报导，右派开始攻击中共领导的时候，林克告诉他，毛这次受到重大打击，一天到晚睡在床上。（《李志绥回忆录》，187页）更重要的是，反右并没有使毛改变整官僚主义的一贯倾向。

毛为什么从五六年起激烈起来了呢？道理相当简单。毛一贯革命。只不过，在四九年以前，革命是中共的共同事业。四九年到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大致还是采用革命的方式。到五六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中共整体上转向常规统治。变的是中共，而不是毛。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变是正常的，自然的，而不变是反常的。意识形态式的革命夸大自己的目标。本来，革命只有有限的目标，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某种较能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政权，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度，等等。达到这些目标以后，革命的领导层自然就准备转变自己的职能，准备按部就班来治理这个国家了。然而，现在革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意识形态之上，要建立一个人民彻底当家作主的制度。五六年，这样的目标当然没有实现，其实也永不可能实现。然而，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却恰是作为革命党同时又作为意识形态党的共产党整体制定的目标。毛坚持这个目标，从而始终在思想上掌握着中共的领导权。中共上层所要实现的转变，虽然是自然的转变，却始终不理直气壮的。中共本来是个革命党，而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毛的革命性显得格外触目。毛也正是在这时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前人已经论证过，五八

年六十条里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是毛最基本的思想，时髦的一贯思想。只不过从前本来就在革命，不必提它。只是到了五六年以后，才出现了党不再打算革命的危险，从而才有提出“不断革命”的必要。毛要不断革命，就和中共之为统治者的基本地位基本取向发生了矛盾。从这时起，毛逐步走上了与党为敌的道路。反右之后，反右倾是针对党内的，四清是针对干部的（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六年九月八大通过的刘邓路线，毛从来没有喜欢过。十三年毛都不满，直到六九年九大。八大中委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严重冲击即为一证明。毛对这一点是有明确意识的。他自我总结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这是大多数人支持的（即中共作为整体支持的）；另一件是搞文化大革命，这是引起中共整体反感的。

五七年，毛和党离破裂不远，反右推迟了两者的公开冲突。但如刚才说的，反右并没有改变反官僚主义的总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突出。李志绥写了毛怎样把北京医院叫做“老爷医院”，要取消北京医院，取消保健局，提到医院只给百分之十五的病人看病，农民看不上病，医生戴口罩是做老爷的表现。这些话好多是私下闲谈时说的，更能表现一种思想倾向，而不像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政治权谋的因素往往很重。在所有这些提法中，有一种基本倾向贯之始终，这应是很清楚的。不可能把每一点都理解为政治斗争的伎俩。李志绥认为毛针对刘少奇的病而主张取消保健局，这看法显然过于狭隘。李志绥是医生，毛和他谈到医疗部门就格外多些。毛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却是全方位的，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各种发言各种批示都针对“老爷作风”：“（全国文联）这些协会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

毛的反官僚不仅范围越来越广泛，官僚阶层的邪恶性质在毛的眼里也逐步升级。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官僚”这个名称不是太可怕，官僚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升了级，成了和人民对立的阶级。到一九六四年，即文革前夕，毛明确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到文革中，官僚阶级成了党内的走资派，甚至党内的一个资产阶级。“走资派”是个极重的罪名，绝不在“反革命”之下。毛把他们称作为“大大小小的蒋介石”。这是公开发表的言论。一般说来，公开发表的言论还是比较注意“政策性”的，比较平衡些。私下的言论要更极端。例如毛对李志绥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其狠恨一至于此！——即使说到蒋介石日本人美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毛也没这么发狠。不过在日常语言里，“走资派”这个名字始终不如“反革命”吓人，那只是因为走资派始终还在走，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各级政权。如果政权完全落在毛主义文革派手里，“走资派”也许会成为最可怕的名词。

毛对所谓官僚主义的痛恨逐步升级，这和五六年以后的一系列党内政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不遑审视这一发展过程。反正到文革前夕，毛已经把中共领导阶层整体看作了革命的对象。叶剑英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说，毛在发动文革时，“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这成了后来很多文章的分析要点。我认为泛泛说毛当时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原在于，毛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估计形势的。毛是站在反对整个十七年（确切说是五六年到六五年的十年）统治模式的立场上来估计形势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农村工作路线，所有战线，都要改。形势自然就很严峻了。高饶模式和庐山模式等党内斗争形式自然就显得不足。必须直接发动群众。四清等等运动，毛的本意都在发动群众来整顿新的领导阶层，结果都不如愿。直到文革，毛站在天安门上直接面对百万红卫兵，他才颇为满意地说，这场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种满意来自拿文革和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冷冷清清的政治局面相比较，而不是来自某种政治谋略的成功。

## 二、

我们不愿把文革看作宫廷政治。纯粹的权力斗争当然对群众也有影响，例如进行权力斗争

的双方可能利用群众。这种影响，民间有一句生动的話，就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权力斗争说实际上就是主张文革说到底是在运动群众。在这一关键点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相当矛盾的图画。一方面，群众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文革，对十七年秩序的反感是这热情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但是另一方面，等整个文革过去了，很多人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幻灭的感觉，被运动了一番的感觉。不止是感觉。今天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文革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一场革命？比较一下一七八九、一九一七、一九四九等等，这些革命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社会结构，等等。文革留下了无数故事，从恩恩怨怨直到精神转变，但它是否具有以上这些革命的社会政治结果？总的来说，没有。

泛泛讲，革命是群众的节日，群众天然具有破坏既有秩序的冲动。任何秩序，哪怕是最合理的秩序，也具有压迫性质。较具体一些，十七年的中共官僚秩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毛反秩序反理性，并相信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群众这一边的，或群众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并非没有道理。被压迫者，亦即毛所称作“人民群众”的，本来就有反秩序反理性的倾向。谁最喜欢理性喜欢秩序？四十岁的优裕阶层，有了资产有了社会地位的人。理性和秩序本来就具有压迫性质。即使比较合情合理的理性主义也难免，更别说十七年的那种秩序了。共产党是格外讲求秩序的，像通奸和商业投机这类典型的无序现象，自有人类以来至少有了都市以来几乎没有断绝过，居然到了共产党手里就清除了。有秩序本身是不赖，但另一方面，连同秩序而来的压迫也越甚。广大群众对秩序从来就有抵触有抗拒。对共产党造成的十七年的那种秩序更有强烈的反感。毛的反理性反秩序，激活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反感。所以才有文革开始时那番轰轰烈烈。

然而，单单从群众反秩序的天然倾向是无法解释文革的，因为这种倾向无时不在，文革却千年一遇。文革之所以会爆发，有赖于人民群众已经受到一种特定的教育，对这样的革命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上一节提出，毛反官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由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三者构成的。而这三个方面，多在十七年的教育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充份地灌输给了群众。我说毛的意识形态掌握着领导权，主要是就此而言的。中共高层逐渐转变为一个常规的统治阶层，但他们没有充份的法理来为这种转变进行辩护。他们必须假装说，掏粪工人和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学生造反，他们只能说是娃娃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开始为自己设立范围极广的特权，但这一切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为原则上，所有人——反革命份子除外——都是平等的。

中共高层没有他们的思想体系。毛有。而这个思想体系就是文革爆发时人民群众的思想体系。难道我们真能否认，当时革命群众和毛心连心那股劲头啦？把这样的思想准备说成是受骗上当未免过于轻描淡写。因而，与其说群众的热情来源于对十七年的压迫和反抗，不如说是出于受到毛思想深深的熏陶，从左面对十七年的反感。

然而，如上一节提示的，毛的思想体系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就其基础而言处处都是裂隙。当文革变成现实，这个基础完全承受不住这个现实的压力，整个现实也就倒塌下来。人民群众和毛同行了一程，最后是人民先醒过来，因为他们先要承担现实的压力。中国人把意识形态的统治推到了极端，这个过程有两个句号，一个在七六年，一个在八九年。看起来，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在中国已经彻底结束。无论盼望还是担忧另一场文化大革命，还是希图重新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都不得要领。

意识形态在这两个世纪的政治生活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事实。然而，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的政治也许只是一种畸形的政治。文革是意识形态政治的极端体现，它暴露出这

种政治方式的众多畸形性质。本节主要想说明，毛的文革思想不是正常的政治思想，文革也不是一场常规的政治革命。因而，文革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积极的结果。文革后期人们对文革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幻灭感，是文革的应有之义。

上面所讲的，为我们研究毛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个稍有新意的角度。常见人们把毛比作皇帝。这个类比错失了本质之点：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毛不仅是政治权威，他同时是思想权威。

毛像皇帝一样是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政治活动中无论如何都要加以维护的。美国总统是可以弹劾的。从这里看，美国总统更接近行政首脑而非政治权威。美国的政治权威主要体现在宪法上。有合法的办法废掉总统，却少有合法的办法废掉皇帝。废掉皇帝多为道德的理由而非行政的错失。无论在行政上出了什么差错，无论怎样改变政策，补救过失，其它办法都可以想，但不能考虑取消权威，仍要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并不只限于共产党，也是皇权制度下统治集团的共识。岳飞为什么不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反了皇帝？维护政治权威，不仅对统治阶级极为重要，而且经常对民族对国家都是有利的。中共早就开始建立毛的政治权威，不一定完全想模仿皇权，但是从政治出发，维护毛的政治权威对党是有好处的。这一点，彭德怀有时候不理解，有时候将信将疑。他大致是把毛看做行政首脑。而在庐山上，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去劝他，就是从维护政治权威的角度多多少少说服了彭德怀。

皇权制度下，皇帝的政治权威极高。在那些把毛比作皇帝的人眼里，皇帝似乎事事一个人说了算。但实际上没有那样的政治现实。没有任何地方会有绝对一个人说了算的现实。而是说，只能在内部反对皇帝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反对，但不能对外公开反对皇帝。后来人们对皇权的实际情况知道得多了一点，说皇帝也比不了毛的独断专行。这是事实，不过还没有道出毛为什么有这样的地位。仅仅从毛特别凶狠狡猾也解释不了，因为历史上也有很多皇帝特别凶狠特别狡猾。在毛眼里，即使最伟大的帝王也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话，不够文，没有主义。晚年的毛，在政治上高度不负责任，但是他的政治权威几乎不受挑战。我想不出历史上有同样程度的例子。这只是因为，毛的政治权威有一重思想权威的来源。毛不仅在政治上行，而且从根本上代表了共产党的理论根据。

不管皇帝的政治权威有多高，皇帝不是思想上的导师。圣旨至高无上，可以作为政治的行政的“最高指示”加以引证，但臣僚从来不引用皇帝的说法来裁决道德与思想问题。在道德与思想问题上，总是引用古代的圣人，甚至引用当时的有识之士。官僚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比皇帝的权威还高一些，这也是皇权和官僚集团达到平衡的一个砝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的地位不是一般皇帝比得了的。就此而论，只有霍梅尼这样的角色才接近些。毛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是思想上的导师。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经常恣意胡说，明知他无理，不敢反驳。但毛的基本逻辑，反对官僚主义的逻辑，号召人民起来造反的逻辑，却是共产党人驳不倒的，因为那原是共产党自己的逻辑。

在对政治的看法中，最开始具有印象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 Real politik 来看待政治，以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这种看法貌似深刻，实际上并不中肯。人生从来不是只从得失来衡量的，而且也是从是非来衡量的。我是说，是非在实际生活中，而不仅仅在书本上，是极其重要的，即，是随时随地起着实际作用的。政治不只是一堆权谋。就是最无知识的人，也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希望自己处在正确的阵营里，处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毛提供了这种领导，而中共的其他人却没有。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周恩来等人常说毛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思想家。思想有什么了不起？这里说的思想，不是胡乔木、陈伯达那种理论家的理论思想，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所把握的思想。

毛总说没有人懂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自负自己读了更多的马列，说的无非是谁都没有从

思想上从气质上从根本上像他那样懂得要造反的道理。对毛来说，思想必须熔化在血液中，才是真正的思想。毛对思想的这种理解显然并不全错，例如，教授们党的秀才们读了好多马列，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学理性的思想对毛从来没有吸引力，他的思想是广义的宗教式的，是熔化在血液中的。毛之喜乱，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一个统治者这么喜欢乱，真心喜欢乱，是很奇特的。毛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统治者。哪儿有行政首脑喜欢乱的道理？这里我想指出，毛，特别在他的晚期，主要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行政首脑，甚至主要不是政治权威，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思想导师精神领袖。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毛的很多基本思想。这里只提一下大乱才能大治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乃至胡乔木这么个小人物也忍不住再三和毛争论。但这个说法仍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毛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它配套的还有穷则思变等等。

胡乔木认为这些说法不合逻辑。个人对大治的理解可能不同，但乱只能是手段，总不能永远乱下去穷下去，最后总要到某一种安定的富裕的局面。这样的逻辑，是从行政的世俗的方面来考虑的。我们知道虔诚的教士苦修，他总是为了达到什么果报才苦修的吧？他的幸福观可能和我们的不一样，但他仍然是为了达到他设想的幸福境界，他总不是把苦修当做最终目的吧？诚然。但他所设想的幸福，的确可以和我们所设想的相去甚远。更要紧的还在于，即使他的最终目的看起来和我们的差不多，其意义仍然可以很不相同。一个伊斯兰教徒虔诚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宗教许给他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和我们平时追求的也差不多，比如富贵啦女子啦什么的。但是希图来世得到这些东西和希图此生得到这些东西却大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教徒的行为方式会和一个克勤克俭以图发财致富的人的行为方式大不一样。毛说的大治，并不是行政上的大治，而是指不断革命理想的实现。革命不是手段。相反，行政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增长，倒都是手段，为再一次革命准备物质基础。人们常说，四九年到文革，只要刚过得好一点，毛就开始折腾，就搞运动。在毛看来，这就对了。

人们早已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看到某些宗教色彩。但这还是表面文章。我这里则想强调，毛对国家的设计，对人民幸福的设计，和一般统治者的设计，无论好坏，多不大一样。毛的一套思想，在晚期发展到它的极致，近乎一种宗教思想而不是典型的政治思想。这一设计不是世俗的，因此无法很好地描述。我们都知道教徒信仰天国，但天国是什么样子，总无法很清楚地正面描述。毛的设计也是这样。乌托邦本来被称作世俗宗教。

我们这里无法细论毛的导师意识的发展过程。大致说来，青年毛泽东就有导师意识，不过后来投入实际斗争，不能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自己坐在屋子里就觉得像个导师。从三五年到四二年，毛主要是个行政首脑。四二年以后，中共党内毛这一派为了对付其它宗派，中共作为一个整体为了对付国民党，有意识地树立毛的政治权威，直到四九年以后。整个这段时期，毛显示出在行政方面（这里的“行政”是字面上的即广义的，主要是制定政策）极其能干。毛在这方面也很自负，后来常向人念叨他那些年里怎么一贯正确。甚至到五六年，毛还决定自己出面来指导经济工作，制定钢产量啊粮产量啊，考虑人民公社的核算制度啊什么的。五六年到五九年闹了一通，证明他在新任务面前的行政能力——现在主要是指导经济建设——完全不行。毛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这时，行政工作变得越来越独立了。毛也很快完全失去了对行政事务的兴趣，他对公有制、公社、食堂等等的爱好，渐渐脱离了具体可行的措施，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感召。可以认为，五六年到五九年的行政失败，强化了毛的导师倾向。不能否认，毛曾经想当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想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我们注意到，五九年以后，毛越来越少想到这一方面。文革里喊四个伟大，毛十分冷漠，说他只接受“伟大导师”这个称号。行政首脑的伙伴是官僚集团，而导师是直接面对群众的。

毛对党的概念和刘、周等人截然不同。党在刘、周手里是控制行政部门的机器，而在毛眼

里主要是贯彻思想的渠道，他总是绕开党的官僚机构，直接面对广大党员群众。毛开始逐渐丧失政治常识，这是党内高层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党越来越注重实际统治而毛越来越倾心于不断革命，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毛愈发感到需要直接面对群众。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一部份就来自官僚隔断了他和群众的联系。政治领袖需要动员民众的机器，但毛这时更侧重自己精神导师的角色。

所谓个人崇拜也与此有关。毛当然清楚，官僚在群众之上，他又在官僚之上，他几乎见不到群众。他可以设想他和群众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纽带。但他也需要有形的东西。这条纽带里只有一点是有形的，这就是个人崇拜。很多材料表明，毛在政治上本来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心理上也并没有那份肤浅的虚荣。看看毛站在天安门上接见百万群众的那幅表情就清楚。他说“个人崇拜也许是必要的”，从这话的口气，与其听出他心理上对个人崇拜的需要，更容易听到的是他这时了解到，个人崇拜这时是他和群众联系唯一的有形方式。

毛晚期对群众的关系，不仅是政治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导师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毛的很多矛盾表现，要从这种视角寻找线索。一方面，他坚信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毛在五九年以后曾作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了解他的子民所需要的是些什么。政治家出于种种原因关注民众的需要，导师则告诉民众他们需要什么。一方面，毛到处鼓吹反权威，另一方面，他忍受不了任何人反对他的绝对权威。反对官僚制度与主张民主体制并非就是一回事，毛反对官僚制度因为它使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民亦不能当家作主，这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宣讲的话题。于是实际情形就是，在废掉官僚集团后，只有由毛一个人，及其个人代表（如文革的中央文革以及九大后的政治局）直接与人民面对。而要保证人民不失去这种地位，就只有绝对加强毛的个人地位与权威，即把毛当做绝对不可动摇的上帝本身或上帝的唯一代言人。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则是该特定意识形态的唯一阐释者和执行人。这也就自然地演化出毛在行政上在政治上的绝对独裁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文革时一方面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另一方面则是无孔不入的极权专制。其实文革中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毛的独裁专制，而是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成为了毛泽东的帮凶而形成的群众暴力，这与当年的纳粹主义运动多有相似之处。其实，极权的反权威倾向和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倾向共生，原是个普遍现象，不是在毛那里的特例。我们只想一想我们知识分子中间那些极端反权威的人物就清楚了。一方面，他总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群众所经受的实际苦难，对成千上万的死亡，完全无动于衷。其唯一的解释，就是毛的准宗教的态度。为教旨受苦与牺牲，对于教徒来说，原是正常之事，既无须悲悼，也不形成个人的荣耀。毛不爱他的家庭，不爱他的朋友，不爱他的战友；毛对个人幸福毫无感觉，从不看重物质享受。正如萧延中先生所说，“具体的个人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不仅是无价值的，而且是极有害的。”

## 小结

从思想上说，文革远不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胡闹。它具有充份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以极端形式表明了意识形态政治的虚幻。文革结束后，有人说它的教训在于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人说它的教训在于中国必须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些可能都对。但文革的总体教训无非是：我们再也无法把任何意识形态做成政治建设的基础，无论那是共产主义还是西方民主。

□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12期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六）

• 周孜仁 •

(续上期)

16，重庆问题解决前后

重棉六厂抓捕我的事情发生不久，我便返回学校了。并不是害怕他们再找麻烦，不是的。而是：当时北京已传来消息，说中央认为重庆情况特殊，其问题将在四川问题解决后单独处理。这消息当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毛主席党中央确实太关心山城人民了！还有鼓舞人心的是：总团勤务员秦安全通知我立即回校做资料工作，以备上北京参加会议。我自然喜出望外，兴冲冲返回学校了。据日记载，时间是5月1日，打那时离开《山城战报》，我就再没有以该报编辑人员的身份回去工作过了。

事实上，还在四月底，为了配合四川省和重庆问题的解决，重大815就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百人赴京战斗队”开赴首都开展活动。领队是吴庆举。他非常喜欢主持这类具有悲壮色彩和轰动效应的活动，而且在这类活动里，他总有自我牺牲和独胆英雄一类的上佳表现。1966年9月3日，重大815绝食两天而后徒步上京，数千人呆在北京展览馆及几所中学里孤立无援，凄凄惨惨切切，那一次，便是吴带领一帮人去府右街中央文革接待站苦守多日，终于等来了那位虽为国人却必须随时带翻译说话的夫子陈伯达接见，老头的福建话谁也听不懂。那一次，吴在中南海门口守得确实太漫长也太可怜，以至有一天他自己已痛感顶不住了，遂从府右街捎回一封信，倾吐满腔苦水，甚至对此次北上行动表示了许多绝望。这封信连夜向寒卧北展地铺的数千同学宣读，当即便有意志脆弱者失声痛哭。那一晚我也在，九月秋凉，辗转无法入睡，便和几个同学起而谈议，直到东方之既白。此时，军号忽然响起，紧催集合，一脸乾瘦的总团勤务员黄顺义跳上石凳，声色俱厉地向众人宣布：昨天晚上，吴庆举的信把形势估计错了！现在，我们重新估计！黄激情充沛，演说进到高潮，他总喜欢把话停下来，嘴唇咬得紧紧的，全身凝然不动。他的坚定把大家重新鼓动起来，一直顽强坚持到陈老头接见，算是给刚出道的815挽回了许多面子。返回重庆已是子夜，数千人在山城绕行示威，一路高呼“我们见了毛主席！”把睡意朦胧的重庆市民搞得云里雾里。1967年4月的重大815当然老练多了。其时，北京舆论几乎一边倒。清华《井冈山》报、北地《东方红》报等配合四川、重庆问题的解决大造舆论。《山城在浓雾中》、《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之类耸人听闻的文章就累累登在那一段时间的显赫版面。仅仅读读标题就足以吓人一身冷汗。同样自命不凡的815决定披挂北上，对首都三司进行正面抗击。临行前，在815广场举行仪式，宣誓出发，威威乎激烈壮怀，有点北上抗日的感觉。他们满以为威师所至，一定所向披靡。其实呢，这一次的遭遇并不比1966年9月那次好，甚至可以说糟糕得多：既然北京的“救世主”们在重庆被815砸过抄过，现在你送上门来，首都三司当然决不手软，要来个一报还一报了。815到北京不过几天功夫，北地“东方红”就两次派人光顾他们的住地东大桥接待站——东大桥是新落成的一片住宅区，居民还没入火，政府就临时安排上访人员呆下了——首都造反派冲进住房，把他们从重庆带来的告状材料一抢而空，撕毁战旗，还“绑架、毒打我赴京汇报战士”。好在“重庆崽儿”生性刚烈火暴，素多亡命之徒，住地被砸，百十号人立即开到中南海门口去宣誓，把胆儿壮足了，又开去北京地院找“东方红”抗议示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寡不敌众，自然少不了又被一顿好打——事后，告状团的同学对我说，他们正在无可奈何之时，突然间一彪单车队呼啸而来，一色黄军装、一色铜扣皮带、一律红色无字袖标。飞车队迅速实施包围，继而皮带如长鞭上下，对准“东方红”们便一阵乱打：815趁机溜了。后来知道，飞车队原来就是恶名昭彰的“联动”份子。刊登于《815战报》第十九期头版、写于4月27日的《告首都人民书》，以及刊登于《815战报》第二十一期头版、写于5月3日的“誓词”，除了向首都市民介绍伟大的重庆一月革命和815的忠于毛的拳拳苦心，同时也倒出了在首都遭遇的这段

冤情。“重庆崽儿”的强硬态度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作为参加解决重庆问题的代表赴京工作，曾和赴京战斗队的同学们一起住东大桥，十来天，“东方红”就一直没再来找麻烦。8 1 5在窗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墙上两条字体斗大的对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横批：“坚决自卫”。那画面，分明就是一个月后重庆大规模武斗在首都的试用版。告状团的主持人吴庆举已在几年前作古，而另一些总团勤务员对此事都依稀莫记。我只能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和自己的记忆对告状团的活动记略如上。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是5月6日公布的。紧接着果然接到正式通知，指示重庆问题单独处理。要驻军、革联派和砸派三方派人上京与会。两派群众组织各出代表35名。

革联派的代表是9日晚10点乘20次特快出发的。所有代表先在重大党委办公室集中，统一做了交代，然后齐赴车站出发。会上到底交代了什么，现已无法记忆。我只记得上车后我和后来担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熊代富临座。两天多车程，随时随地都能聆听他讲大好形势，讲革联会地位如何之固若金汤。熊系冶金系二年级学生，性格素多稳健，为人为事周到缜密，在重大八一五总团内部，他和秦安全属同一类色彩，具体日常工作也就他二人做得较多。熊的谈话给人总的感觉就是字字有据，很权威。革联会如此优秀，如果中央不承认，事情就绝对邪门了。

5 4军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等是10日飞京的。其时，我们列车正在路过我的家乡成都，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早上，车过成都……街上一片荒凉，站内也一片荒凉 / 我们在想，重庆是光明的重庆，重庆的革联会有很大的成绩，甚至可以说是一面红旗吧。这次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毛主席既然指示重庆问题要单独解决，那么，一定不能与四川问题的决议那样处理 / 欢笑的车轮，铿铿锵锵地载着我们充满希望的心，驶向北京……”

我们11日晚抵达北京，其时，军方代表已向全军文革作过了长达三小时的汇报，并整理了书面材料上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赴京告状的重大校业余戏剧队的张田春和美术队的傅运政、彭支云等人到车站接了我们，那一晚，我们就在东大桥接待站和同学们一起过了夜。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北京的春天，风沙满天里弥漫，空气干燥，第二天一早就发现鼻子出血：所以我对那段生活记得很清楚。熊代富、秦安全等一早就去54军将领的驻地，当是面聆机宜去了。我非核心成员，在东大桥和同学们玩了一天。

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是我们到后的第三天，即13日进行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汪东兴、王力、关锋诸人与会，群众两派各选十人出阵。砸派七人先行发言，而后革联派三人发言。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已无任何具体可供回忆的材料，我的日记只有如下几句：“我们取高姿态，而砸派以谣言含量达90%的咒骂向我发起攻势。我们摸了他们的底，心里更踏实了，决定下次全面反攻。”这些情况很可能是参加会议的勤务员们告诉我的。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日记，以为自我感觉不错的我们，其实幼稚得实在有点可以。政治领域的所有结果，其实都不能用神圣、正义之类的概念来议价的，而是上层集团利益和实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特别文革。学生充其量只能成为上层行为的背景点缀而已。重庆问题怎么处理？说穿了，得看文革派和军方在分配权力方面如何讨价还价？而毛准备如何从中平衡？从事后知道的情况，这次会议砸派由谁出席？由谁发言？发些什么言？都是由首都三司圈定的，而首都三司背后无疑是中央文革浓厚的影子。同理，8 1 5谁出席？谁发言？发些什么言？也一定有军队在幕后提词。事实上，接见第二天，即5月14日，便有了四川省革筹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八条意见上奏。这些意见如此快捷精准，和后来

公布的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丝丝入扣，他们一定是在得到了上面的授意才能如此写出。让群众代表到接见厅去象征性地发发言，不过是给热血沸腾的造反群众下点毛毛雨，安慰安慰罢了。

14日那天午后，我应召赶去西苑宾馆。54军的耿参谋长正就中央重庆解决问题的意图向815的代表吹风。中央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肯定驻军而绕过革联会，以驻军为核心重新组建革筹小组。山城数月，两派群众诅咒发誓、闹得你死我活的，不就是对革联会这个心肝宝贝，一个要“誓死保卫”而另一个要“坚决砸烂”吗？815巴心巴肝，喊了如此众多口号，写了如此众多文章、对口词、打油诗、甚至还有歌曲，什么“新山城嘿战鼓敲，一月革命卷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了权，滚滚长江拍手笑……革联会就是好，革命红旗永不倒！”现在被中央一句话，便像扔废纸团一样，轻轻松松扔一边了：对于稳操胜算的八一五们，简直无异于噩耗惊雷。这帮政治上的榆木脑袋们完全不明白，肯定驻军，不就是绕着圈子肯定了815吗？他们就知道否定革联，就是否定了自己而肯定了砸派。耿话犹未了，满屋已乱成捅开的马蜂窝，一片嗡嗡营营。好像要找谁而又不知道该找谁拼命似的，大家就发疯似地向楼下跑。耿参谋长闪到楼口，大张双臂阻拦：其实，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到哪儿去？只知道楼梯是唯一的通道，于是就死命往下挣。耿个子不高，但壮硕结实，稳站如钟，确然将大家拦住了。我们几个站后排的人已先冲下楼，正遇春风得意的张西挺站在大楼门口等车。看见这帮凶汉涌来，她一定吓坏了。我们确实认为发现了最佳的泄怒对象，都冲上前去揪她。张且战且退，跳上汽车便绝尘而去。

我已记不起后来两天是怎么渡过的。大约还怀抱着某种侥幸心理吧，以为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中央不了解重庆的真实情况所至。我们还有机会向首长报告的，而且相信最后结果定然会对革联会有利。可惜，中央首长们那样忙碌，哪有闲功夫和你们罗索？两天后，5月1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王力一千人等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第二次接见驻军及两派代表。关于重庆问题的中央文件已经敲定。两派群众代表进场之前，周、康、杨、王等已经先见过了54军领导谢家祥、白斌、耿志刚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等，想必该宣布的都已宣布过了，该交代的也都已交代过了。根据笔者保存的那次接见的记录稿，周恩来一走进群众代表的等候处就开宗明义宣布：“四川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都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接着点名让八一兵团的张益代表815派发言，紧接又让江陵厂砸派代表发言，江陵代表一说完，周恩来就说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接着便开始宣读中央决定，并逐条作出解释。“决定”凡五条，其意略谓：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李井泉、重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任白戈；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三，“立即建立”由54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吸收各派群众参加；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五，要拥军爱民，云云。

我的日记记载了会外人当时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两方的同志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是决定双方政治生命的最最关键的一步，结论会怎么样呢？”站在这儿的造反派们应该说都是些重庆最自命不凡的人，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最不自信的人。站在夜幕里沉默不语的大会堂巨型圆柱之下，就象惶恐的囚徒喘喘不安地等待终审判决。中央领导们对群众代表的接见实际是从17日凌晨1点10开始，至3时33分结束的。双方群众都已无法忍受这种漫长等待的折磨，回驻地去了。

参与接见的两派各十名代表，他们躬身其中，对事件的真谛，比一般群众当要先知先觉些。笔者比较了中央的正式决定和前面提到的张、梁、刘、张四人的意见，虽然大意无甚出入，而正式决定对驻军的肯定程度，却还有甚于四人意见。如：四人意见仅仅说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而正式决定却明确肯定：“有显著成绩的”；四人意见说到驻军在处理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式决定就干脆将此话删了。难怪事后，砸派一个代表曾说，听完五条，心里明白权还在54军手里，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而从接见的记录看，815的代表周家喻，当时信誓旦旦地向周恩来和康生表态要解放全人类，要到保守派产业军去做工作，当算是明白人了。但局外的同学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千里之外的重庆，事情更加糟糕，局面失控到有点象好莱坞大片里峰回路转的悬念故事。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